

修辞学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录

译者导言/1

第一卷/17

第一章/19

第二章/23

第三章/28

第四章/31

第五章/33

第六章/35

第七章/39

第八章/44

第九章/46

第十章/50

第十一章/52

第十二章/59

第十三章/62

第十四章/65

第十五章/67

第二卷 /73

第一章/75

第二章/77

第三章/81

第四章/84

第五章/88

第六章/92

第七章/95

第八章/97

第九章/100

第十章/103

第十一章/105

第十二章/107

第十三章/110

第十四章/113

第十五章/114

第十六章/116

第十七章/118

第十八章/119

第十九章/121

第二十章/124

第二十一章/127

第二十二章/132

第二十三章/135

第二十四章/149

第二十五章/154

第二十六章/157

第三卷 /159

第一章/161

第二章/164

第三章/170

第四章/173

第五章/175

第六章/178

第七章/180

第八章/183

第九章/186

第十章/192

第十一章/197

第十二章/204

第十三章/208

第十四章/210

第十五章/216

第十六章/219

第十七章/223

第十八章/229

第十九章/232

译后记/234

专名索引/236

残害

残害

残害

残害

残害

残害

译者导言

这部《修辞学》的作者亚里斯多德于公元前 384 年出生在马其顿卡尔息狄栖半岛上的斯塔革洛斯特城（后来改称斯塔革拉城），一生都是该城的公民。他的父亲尼科马科斯是马其顿国王阿明塔斯二世的御医。公元前 367 年，亚里斯多德赴雅典，起初在伊索格拉底门下求学，随即转入柏拉图的学园，后来在学园做半独立的研究工作，并兼任教学职务。公元前 347 年，柏拉图死后，亚里斯多德离开雅典，赴小亚细亚阿索斯城从事柏拉图哲学研究和动物学的研究。公元前 344 年，前往累斯博斯岛继续研究动物学。公元前 342 年，应马其顿国王腓力的邀请，做王子亚历山大的师傅，讲授政治学、荷马史诗和悲剧。约在公元前 340 年，回到故乡斯塔革洛斯特城（该城已于公元前 349 年被腓力占领）。公元前 335 年，重赴雅典，在雅典西北部，创办吕刻翁学院，讲授哲学科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诗学等课程。他收藏有大量抄本和科学资料。据说亚历山大曾赠送他大量金钱，并命令各地猎人和渔人供给他资料。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死后，雅典掀起反马其顿运动，亚里斯多德被控犯有不敬神的罪名。公元前 322 年，他在受审之前逃往欧卑亚岛，于同年因肠胃病死在岛上。

亚里斯多德现存的文艺理论著作只有《修辞学》和《诗学》两种，他还著有一篇讨论修辞术的对话，叫做《格律罗斯》，一篇讨论风格与安排

的论文，叫做《忒俄得克忒亚》，这两部著作大概是在学院讲学初期编写的。此外，他还编辑了一部《修辞学课本汇编》（已失传），作为编写修辞学的资料。至于在亚里斯多德名义下传下的《献给亚历山大的修辞学》，一般认为并不是亚里斯多德的手笔，而是亚历山大的随军侍从阿那克西墨涅斯（公元前 380?—前 320?年）的著作，这部修辞学只是过去理论的重述，作者把修辞术作为哄骗听众的“说服技巧”。

所谓“修辞术”，指演说的艺术，包括立论和修饰词句的艺术。古希腊的演说主要是散文，所谓“演说的艺术”，也就是散文的艺术。

古希腊散文的发展比诗（指史诗和抒情诗）的发展晚得多。公元前 6 世纪以前，所有的希腊文学作品，以及哲学论文、科学著作等，几乎全都是用诗体写成的。公元前 6 世纪，伊奥尼亚（小亚细亚西海岸）、西西里、爱琴海上诸岛屿，以及希腊半岛上的一些城邦先后出现一些政治野心家，他们借民众的力量推翻贵族寡头派，夺获政权，成为独裁君主（一译“僭主”），他们先后被民主力量推翻，于是出现民主政治。独裁政府和民主政府都提倡民间文艺，而人民所喜闻乐听的是故事，因此用散文体讲故事的民间艺人大受欢迎，最早的伊索寓言就是用散文体讲述的。以上是散文兴起的第一个原因。

公元前 5 世纪上半叶，伊奥尼亚一带的希腊哲学家接触到东方用散文体写的哲学著作，他们也就抛弃了诗体，改用散文来著述。这是散文兴起的第二个原因。

公元前 5 世纪中叶，西西里一些希腊城邦的独裁君主被民主力量推翻；民主政府成立之后，有一些被放逐的贵族回到自己的城邦，他们为了收回被独裁政府没收的土地和财产，需要诉讼知识。此外，遗产的继承和工商界的钱财纠纷引起诉讼，当事人也需要这方面的知识。于是传授这种知识的职业应运而生。西西里叙拉古城的科刺克斯和他的弟子提西阿斯首先编写修辞术课本，在雅典传授诉讼知识，教人以似是而非的论证取胜。这种职业教师称为“智者”（sophistes），后来由于他们受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攻击，“智者”一词才含有“诡辩者”的意思^[1]。他们主要

讲授修辞术，也讲授文学、哲学、数学等。在民主政体下，富豪子弟想在政治上谋出路，也向智者学习修辞术。当日的政治家也就是演说家，雅典的情形尤其如此。以上是散文兴起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大多数智者都玩弄诈术，强词夺理，混淆是非，但是也有一些智者是著名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西西里最有名的修辞学家是高尔期亚（公元前 483?—前 376?年），为提西阿斯的弟子。他于公元前 427 年出使雅典，口吐珠玑，轰动全城。他在雅典讲授修辞学。他讲究对偶与节奏，采用诗的词汇与出色的隐喻，使散文带上诗的色彩。他传下两篇演说。

希腊本部的修辞学家重视语言的正确性，提倡朴素的风格。他们当中比较著名的是普罗塔戈拉（公元前 481—前 411 年）和普罗狄科斯（公元前 5 世纪末叶的人）。普罗塔戈拉首先采用科学方法研究希腊语言，分析语法。^[2]普罗狄科斯研究同义字的区别和用法。

公元前 4 世纪是希腊修辞学和散文的黄金时代，出现十来位著名的演说家和两大修辞学家——伊索格拉底和亚理斯多德。

伊索格拉底（公元前 436—前 338 年）是普罗塔戈拉、普罗狄科斯、高尔期亚和苏格拉底的弟子。他首先研究政治演说的艺术，重视实际的政治问题，认为题材应当是重大的，思想应当是高尚的。他断言口才可以伸张正义，驱除邪恶。他把语言看作性格的表现、心灵的美德的反映。他反对诡辩派传授的诈术。他认为修辞术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没有固定的技巧可言。他主张散文应当有节奏。他强调隐喻字的重要性，重视字音的和谐，要求严格避免两字之间的元音碰在一起。他首先主张采用“环形句”。他认为风格应当与题材和时机相适合。

伊索格拉底认为波斯的入侵是主要危险，他起初主张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向波斯进军，后来力劝腓力联合希腊各城邦去攻打波斯。

伊索格拉底传下二十一篇演说，其中最著名的是劝希腊人向波斯进军的《泛希腊集会辞》和称赞雅典城的《泛希腊雅典娜节辞》。他的风格流畅、精确、和谐，但是有些单调。亚理斯多德早年也曾摹仿这种风格。

这种风格成为拉丁语和后世欧洲语言的基础。伊索格拉底自公元前 392 年起，在雅典讲授修辞学四十多年，弟子多达两百人，其中一些成为著名的演说家，包括伊赛俄斯、吕枯耳戈斯、埃斯喀涅斯、许佩瑞得斯，这四个人连同伊索格拉底本人，被列入雅典“十大演说家”的行列。^[3]伊索格拉底还有一些弟子成为史家和悲剧诗人。

古希腊最著名的演说家是狄摩西尼（公元前 384?—前 322 年），为伊赛俄斯的弟子。他认为马其顿的入侵是主要危险，主张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进行抵抗。他一生反对马其顿，失败后服毒自尽。他传下三十四篇演说，其中最著名的是为他的反马其顿政策辩护的《金冠辞》和《第三篇反腓力辞》。他的风格雄壮、严厉，处处流露出强烈的情感，最能激动人心。他具有伊索格拉底的一些优点，而比较自然。亚里斯多德由于政治原因，很少提起狄摩西尼。

柏拉图（公元前 429—前 347 年）的修辞学理论主要见于他的对话《高尔期亚篇》和《斐德若篇》。柏拉图攻击智者派教师，认为高尔期亚等人的目的和方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顾真理与正义，只图把事情说得“似真”，自圆其说，其实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用巧妙的言辞颠倒是非。柏拉图在《高尔期亚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修辞术并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谄媚的手段，卑鄙的技巧，只能说服没有知识的听众。柏拉图并且在《斐德若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写文章的人必须知道所谈问题的真理，必须用科学方法去求得事物的本质，把那些与题目有关的零星散乱的事项统摄在一个普遍的概念之下，然后进行分析，看出全体与部分、概念与现象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是“论辩术”，在柏拉图的心目中，除了论辩术以外，别无所谓“修辞术”。柏拉图认为写演说辞或做文章要重视题材，要讲究安排与组织，要懂得听众或读者的性情和心理，看他们在心理上属于某种类型，就用与那种类型相适应的言辞去说服他们，否则就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柏拉图还认为风格是性格的反映。

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理论，和他的诗学理论一样，也是师承柏拉图，而又对柏拉图的理论有批评和发展。

亚里斯多德写《修辞学》的动机，在于反对柏拉图否定修辞术是艺术的说法。他的另一个动机，在于反对伊索格拉底的教学方法。据说亚里斯多德在学园的时期就瞧不起的被书商沿街叫卖的伊索格拉底诉讼辞，忌妒他的过高名声，他因此戏拟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菲罗克忒忒斯》（已失传）中的诗句：

让伊索格拉底说话而自己不说，是可耻的，^[4]

来表示要创立自己的修辞学说的决心。据说亚里斯多德曾在一篇评论修辞术课本的文章里指责伊索格拉底，引起伊索格拉底的弟子刻菲索多洛斯的反击，亚里斯多德的修辞理论受到批评，他的人身也受到攻击。伊索格拉底本人也参加论战，挖苦亚里斯多德是一个冒充什么都懂的普通“学者”。^[5]亚里斯多德与伊索格拉底之间是有冲突，但是从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对待伊索格拉底的态度以及他大量引用伊索格拉底的演说辞一事看来，这个冲突并没有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严重。

《修辞学》这部著作大概是亚里斯多德在重返雅典之前就已经动笔，而在吕刻翁讲学时期内完成的。《诗学》大概是在《修辞学》第一、二两卷完成之后，第三卷尚未动笔之前，在吕刻翁学院完成的。《修辞学》第三卷大概是根据《忒俄得克忒亚》补充而成的。亚里斯多德曾在《诗学》第十九章说：“有关‘思想’的一切理论见《修辞学》。”他并且在《修辞学》第三卷第一、二两章提起《诗学》。这些话和《修辞学》第一卷第十一章末段中涉及《诗学》的一句话（“关于滑稽的事物，我已经另外在《诗学》里下了定义”），可能是成书以后补订的。

亚里斯多德根据人类活动的区别，把科学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性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哲学；第二类是实用性科学，如政治学、伦理学；第三类是创造性科学，如诗学、修辞学。他认为理论性科学是为知识而知识，只有其他两类科学才有外在的目的：实用性科学指导行动，创造性科学指导创作活动。亚里斯多德因此把诗学和修辞学作为弟

子于学业将完成时学习的功课，这两门功课的目的在于训练弟子成为诗人和演说家。他的弟子当中只有忒俄佛刺斯托斯成为雅典最后一个著名的修辞学家，得墨特里俄斯成为雅典最后一个著名的演说家。

《修辞学》不是“修辞术课本”，而是科学著作。这是欧洲文艺理论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理论著作。这部书成书的时候，古希腊散文的黄金时代刚刚过去，因此亚理斯多德有可能根据当时的哲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来探索演说的论证方法与创作原则，并对散文作出扼要的总结。

《修辞学》开头一句是：“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这句话表示修辞术是一种艺术，它和论辩术相似而不完全相同。^[6]修辞术和论辩术的题材都是有两种可能的或然事理，一般人的“意见”。这两种艺术的论证方法都采用三段论法，修辞术中的三段论法叫做“恩梯墨玛”（得出或然式证明的修辞式推论）。^[7]修辞术和论辩术的差别在于修辞术采用连续的讲述方式，论辩术采用问答方式；修辞术面向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听众，论辩术面向少数有知识的听者。亚理斯多德总结说，修辞术就像是论辩术的分支，也像是伦理学的分支，伦理学应当称为政治学，因此修辞学也就像是政治学。^[8]以上这些是对柏拉图否定修辞术是艺术的答案。

智者派教师给修辞术下的定义是：“说服的技巧。”所谓“技巧”，实际上是指诈术。亚理斯多德否定这个说法，他给修辞术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9]所谓“说服方式”，是指言之成理、合乎逻辑的论证方式。

亚理斯多德进而指出，修辞术是有用的，可以使真理和正义获得胜利；如果判决不当，那是由于演说者不懂修辞术的缘故。艺术的功能就在于找出成败的原因。亚理斯多德顺便攻击智者派滥用修辞术，他说，造成“诡辩者”的不是他们的能力，而是他们的意图：故意混淆黑白，颠倒是非^[10]。

亚理斯多德采用历史的观点，追溯修辞术的发展，对以往的修辞术研究加以总结。他指责当日的修辞术课本编纂者只重视诉讼演说，只谈

题外的东西，教人如何打动陪审员的情感以求获得有利的判决，而对于作为修辞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则无话可说。他还指责他们只谈诉讼演说的艺术，而不谈比较重要的政治演说艺术。

或然式证明分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不属于修辞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例如依靠见证、契约等而得出的证明。第二大类是属于修辞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这一大类又分为三种，即依靠演说者的性格而产生的或然式证明（演说者的善良性格是最有效的说服手段），依靠使听众处于某种心情而产生的或然式证明（听众在某种心情下容易被说服）和演说本身所提供的或然式证明。这最后一种又分为用修辞式推论（演绎法）推出来的证明和用例证法（归纳法）推出来的证明。修辞式推论的前提是或然的事，因为演说中所讨论的事都有另一种可能。演说中提出的“证据”，有的是有必然性的，有的是没有必然性的。

从前的修辞学家把演说分为诉讼演说和政治演说。亚理斯多德则首先按照听众的种类和演说的性质，把演说分为诉讼演说、政治演说和炫耀才华的典礼演说，以便于分析各种演说的题材、论证方法和风格。这种三分法为后来的修辞学家所接受。

亚理斯多德认为演说者要熟悉所讲的题材，例如政治演说者要熟悉财政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等，要了解各种政体的利弊，还须知道什么是幸福、好事、美德、恶德等；诉讼演说者要能分析害人的动机、害人的心情、受害者的性格，要能辨别正当的行动与不正当的行动。

以上是第一卷的主要内容。

第二卷前十一章分析情感，例如愤怒、友爱、恐惧、怜悯等。亚理斯多德继承柏拉图的观点，认为听众对演说者的态度不同，他们的判断就不同，所以演说者须懂得听众的心理，以便激发或控制他们的情感。亚理斯多德对于恐惧与怜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诗学》中提起的悲剧功用。第二卷第十二到十七章分析年轻人、老年人、壮年人、贵族、富人、当权者的性格。这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性格描写。要了解听众的不同性格，才能激发或控制他们的情感。

第二卷第十八至二十六章又回头讨论修辞术的题材与说服的方法：怎样论证事情是可能的或不可能的；是发生了或没有发生；怎样使用例子、寓言、格言；修辞式推论有哪些主要形态（即部目^[11]）；对方的论证怎样反驳。

亚里斯多德花了两卷篇幅来讨论修辞术的题材与说服的方法，他认为这些是修辞术的主要内容。他曾经批评修辞术教师只教人如何打动陪审员的情感。他并且宣称：“我们应当根据事实进行论战，除了证明事实如此而外，其余的活动都是多余的。”^[12]可是他自己也曾在第二卷里大谈如何利用听众的心理。

第三卷讨论演说的形式——风格与安排，这是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理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亚里斯多德认为一个演说者只知道该讲些什么是不够的，还须知道该怎样讲。他首先提出朗读问题。朗读是读音问题，就是怎样利用声音来表达各种情感。朗读与朗诵是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在当日的戏剧演出中，演员的作用甚至比剧作家的作用还要大，演出的成败往往系于演员的技巧。可是这个问题和语言问题一样，在当时还没有人很好地研究过。亚里斯多德再三指出演说应当能上口，容易朗读。这是一条有用的原则。

亚里斯多德指出，散文的风格不同于诗的风格，不应当有诗意。散文不应当从诗里寻求标准。他认为散文风格的美在于明晰。散文的风格不能流于平凡，也不能提得太高，而应当求其适合。他说：“风格如果能表现情感和性格，又和题材相适应，就是适合的。求其适合，就是对大事情不要太随便，对小事情不要太认真。”^[13]适合的风格使人认为事情是可信的。可是风格要怎样才能求其明晰呢？亚里斯多德回答说：“在名词和动词中，只有普通字才能使风格显得明晰。”^[14]这种字是大家所熟悉的，容易理解的。亚里斯多德指出：“风格太繁缛，就不明晰；太简略，也不明晰。显然，只有不繁不简的风格才是适合的。”^[15]散文的风格虽然不同于诗的风格，但也要有一定的提高。亚里斯多德认为隐喻字和附加词（指性质名词和性质形容词）可以使风格有所提高而不流于平凡。在散

文里只有普通字、本义字和隐喻字才合用。亚理斯多德特别重视隐喻字的用处，他说：“我们应当在散文里对隐喻字多下苦功，因为散文的手法比韵文少一些。隐喻字最能使风格显得明晰，令人喜爱，并且使风格带上异乡情调，此中奥妙是无法向别人请教的。”^[16]隐喻使人从相似的事物中突然有所领悟，因而感到惊奇。亚理斯多德教人这样使用隐喻字：“想恭维人，就从属于同一类而比较美好的事物中取得隐喻字；想挖苦人，就从比较丑陋的事物中取得隐喻字。例如，你有两个属于同类的对立字，你可以说乞讨者在祈祷，或者说祈祷者在乞讨（二者都是恳求的方式），这就是按照我所说的方式使用隐喻字。”^[17]说乞丐在祈祷是恭维人，说祭司在乞讨是挖苦人。关于附加词，亚理斯多德说：“第三种（造成呆板风格的）原因是使用过长的或不合时宜的或过多的附加词。诗里宜于说‘白’乳，这种字在散文里不大相宜，用得太多了，就会暴露作者的手法，使散文变成了诗。然而这种字又非用不可，因为它们使风格不流于平凡。……使用这种字必须掌握分寸，否则比随便说话还要有害，因为随便说话，风格不好罢了；不掌握分寸，风格反而糟糕。”^[18]

亚理斯多德认为各种手法的使用都要合乎时宜，都要有分寸。他强调说：“（作家）必须把他们的手法遮掩起来，使他们的话显得自然而不矫揉造作；话要说得自然才有说服力，矫揉造作适得其反。”^[19]他并且说：“还须立刻显示你具有某种性格，使观众认为你是这样的人，对方是那样的人；但是不要让他们看出你在做什么。从报信人那里可以看出，这是很容易显示的：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消息，可是一眼就能猜到一些。”^[20]这个论点成为古代修辞学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此外，亚理斯多德还强调风格的生动性。他说：“措辞要是能使事物呈现在眼前，也能受欢迎。”^[21]他举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十一卷第574行作为例子：

那些长枪栽在泥土里，依然想吃肉。

这行诗形容一些长枪还没有达到目的就落地了，它们依然想刺杀大埃阿斯。

亚理斯多德认为诉讼演说的风格应当简洁、质朴，也要有一定的精确和完美。政治演说的风格完全像一幅浓淡色调的风景画，群众越多，景色越远，所以在这种风格的图画里，过于精确是浪费笔墨，反而糟糕。他说：“笔写文章的（按：指供阅读的典礼演说）风格最精确不过；论战演说的风格最适合于口头发表。……作家的演说在论战场合显得淡薄；而演说家的演说，尽管口头发表很成功，拿在手上阅读，却显得很平凡。”^[22]后来修辞学家在亚理斯多德理论的基础上把风格分为质朴的风格，以吕西阿斯为代表；雄伟的风格，以狄摩西尼为代表；介于两者之间的风格，以伊索格拉底为代表。

至于散文的句子，亚理斯多德认为应当采用紧凑的环形句，而不应当采用松弛的串联句。^[23]所谓“环形句”，指意思完全，有头有尾，容易掌握的句子，其中有对比，有反衬，这种句子讨人喜欢，容易记忆，容易理解。所谓“串联句”，指没完没了，要等到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时候才告结束的句子，这是旧体，由于没有限制而不讨人喜欢。如前面所说，采用环形句的原则，是伊索格拉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亚理斯多德对环形句有深入的分析，并且指出它的许多优点。

关于节奏问题，亚理斯多德说：“散文的形式不应当有格律，也不应当没有节奏。散文有了格律，就没有说服力……同时还会分散听者的注意力，使他期待同样的格律何时重复。……可是没有节奏，就有限制，限制应当有……因为没有限制的话是不讨人喜欢、不好懂的。”^[24]在西方语言里，这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如前面所说，这个原则是伊索格拉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亚理斯多德对散文的节奏有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史诗的长短格太庄严缓慢，而合乎舞蹈的短长格又太轻浮短促。他也不赞成采用伊索格拉底推荐的合乎日常谈话腔调的短长格节奏（因为这种节奏容易形成格律，例如戏剧中对话的短长格格律），而主张采用派安格作为散文的节奏。派安格的音步由一个长音缀、

三个短音缀组成，长音缀一般放在音步的首位，也可以放在其他位置上，这样才不至于形成格律。

第三卷最后部分讨论文章的安排。亚理斯多德认为文章要有适当的安排，使听众易于理解。这部分里提起许多修辞技巧，可以用来加强演说的说服力。例如，应当先反驳对方可能提出的论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论点。又例如，有时候不必把所有的事实连续陈述，因为这种陈述不容易记忆。

第三卷在本书中并不占重要位置，但是对后世欧洲的修辞学和散文风格有很大的影响。

列宁在评论亚理斯多德的《形而上学》的时候说：“最典型的特征是处处都显露出辩证法的话的萌芽与探索。”^[25]这句话也可以应用到《修辞学》上面，因为这部著作也处处运用一种朴素的辩证方法。亚理斯多德往往从两方面论证一件事情，有时候认为从两方面看都有道理，有时候指出从某一方面论证是谬误的。例如第一卷第七章第三段指出，“本原”与事物的重要性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论证，原话是：“一件东西可以从两方面显示出它比较重大，第一，因为它是本原，而另一件不是；第二，因为它不是本原^[26]，而另一件是，这是由于更为重大的是目的，而不是本原。”又例如，第二卷第二十三章第三段指出“正当地”一词如果可以用在害人者身上，也就可以用在受害者身上，但是这个论证可能导致谬误的结论。这一类的例子是很多的，特别见于第一卷第七章、第二卷第十九及二十三章。此外，亚理斯多德还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于内部的发展，例如，他指出各种政体可以由于内部的发展而坍塌^[27]。这也是辩证地看问题。

亚理斯多德攻击诡辩术，但是他自己也很好辩，有时候以克敌制胜为目的，不惜采用诡辩说法，他是在把他的逻辑著作，特别是《部目篇》中的做法带到修辞学里来。例如，第一卷第十五章说：“成文法对讼事不利，就利用普通法和平衡法。我们可以这样说：陪审员发誓要按照自己的最好意见判决，意思是说，他不完全拘泥于成文法……成文法对讼事

有利，我们就说：陪审员发誓要‘按照自己的最好意见判决’一语，不能用来作为他违反法律而判决的口实，只能用来使他不至于在不懂得法律意义的时候被认为是赌假咒。”对同一句话作出两种彼此相反的解释，分明是诡辩。同一章论誓言一段所举的理由，也是诡辩。第一卷第十五章论契约如何利用，也是诡辩。第二卷第二十五章论例子如何利用，也是诡辩。可见诡辩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气，几乎人人都受到感染，不过轻重不同罢了。

亚里斯多德出身于卡尔息狄栖贵族，他始终保持着贵族阶级的意识，用贵族的观点来看事物。《修辞学》中提起的“自由人”（例如第三卷第十八章末段），都是指贵族阶级的奴隶主。亚里斯多德对奴隶和穷苦的人抱鄙视态度，说什么“被奴役的人、卑贱的人……是不会感到愤慨的，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一样东西是他们应当得到的”^[28]。他在《修辞学》中谴责雅典人奴役希腊人，^[29]可是他对马其顿对希腊各城邦的残酷侵略却默不作声。亚里斯多德的政治观点也是反动的。他对工商业界“暴发户”的攻击，也是从贵族的眼光出发的。他说，暴发户的钱财似乎不是他们自己的，一向富有的人的钱财才是他们自己的。^[30]他还说：“一个暴发户就是一个没有受过用钱训练的人。”所谓“受过用钱训练的人”，指贵族子弟，而工商业界的富人，在亚里斯多德看来，都是没有受过用钱训练的暴发户，“具有更多更坏的恶德”^[31]。从这里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反对工商业界民主派，拥护贵族寡头派的反动思想。在他的思想城邦里，商人和工匠不得享受公民权。他并且认为民主制度“有缺点”^[32]，大概是指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太多。亚里斯多德不喜欢雅典的民主制度。他对于当权者却有好感，认为他们有责任心，“有威仪而不盛气凌人”^[33]。他心目中的理想的当权者，也就是贵族阶级的人物。

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称赞农民，他说：“我们尊敬慷慨、勇敢、正直的人。我们认为不依靠别人而生活的人，就是这样的人；自食其力的人，特别是农民和其他为自己而劳动的人，也是这样的人。”^[34]但是这个看法和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的看法既符合又矛盾。在《政治